

浅谈宋代墓葬中的牛首人身俑

臧天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生）

摘要：江西、四川地区的宋代墓葬中，常见一类独有的随葬明器——牛首人身俑。大体可将此类俑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十二时俑之一的牛首人身俑，二是独立出现的牛首人身俑。它们在墓葬之中都体现了保卫墓主灵魂的功用。

关键词：宋 墓葬 牛首人身俑

两宋之际，由于佛教、道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传播，灵魂不灭等鬼神信仰对民间丧葬观念产生的影响也愈发深远。“凡大葬后墓内不立盟器神煞，亡灵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生人不吉，大殃咎也。”^[1]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广泛流行的祈求神灵保佑，保证墓主亡魂生活安宁，不受鬼魅侵害的丧葬文化观念。在宋代墓葬随葬诸俑之中有一类牛首人身俑，常于今江西、四川地区出土。其中与若干兽首人身俑成套出现的，应为十二时俑的一员；单独出现

中，而牛首人身形象的描述与记载，则古来有之。古代中国关于牛首人身形象的描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之中的炎帝（图1）与蚩尤（图2），《艺文类聚》引《帝系谱》：“神农牛首，结绳而治。”^[2]《绎史》引《帝王世纪》：“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3]又据《述异记》：“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4]以上生动的描述均与“牛首人身”有关，但

这些神话中的人物，并非真的如此，而只是将动物作为自身氏族部落的“图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在民间生活中原始的动物崇拜，尤其体



图1 传说中的炎帝形象



图2 汉画像石中的蚩尤形象



图3 牛首人身俑

的此类俑，在墓葬之中起到沟通天地，保佑墓主之功用，或与当时民间丧葬信仰中的阴间鬼卒“阿傍”有关。本文拟对宋代牛首人身俑的发现与功用加以简单研讨。

一、牛首人身造型溯源

本文所谈牛首人身俑，主要出现在宋代墓葬之

现了对于牛这种动物的想象与敬奉。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古代物质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牛耕普及之后，牛在农业领域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因此也逐渐被神化，出现了所谓“牛王”，广大农民通过信仰牛王、祭祀牛王，以此希望得到神灵庇护，祈盼农



业丰收。牛王的形象，经历了一个由“牛首人身”的半兽半人到完全人格化的过程。《春渚纪闻》“牛王宫铎饭”有这样一段记载：“张黼钤辖家人尝梦为人追至一所，仰视榜额，金书大字云‘牛王之宫’。既入，见其先姨母惊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复多杀，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芒饭一升耳。’始语次，即有牛首人持饭至。视之，皆小铁蒺藜，其大如麦粒，而锋铎甚利。饭始入咽，则转次而下，痛贯肠胃。徐觉臂体间燥痒，即以手爪把搔，至于痒极，血肉随爪而下，淋漓被体。牛首人则取铁把助之，至体骨现露，铎饭尽出。”^[5]张黼在梦中来到了“牛王之宫”，见到的“牛王”是“牛首人”，即牛首人身造型。其姨母因生前好吃牛肉，杀了很多牛，而遭受每日吃铁刺饭的惩罚。由此可见，最初的“牛王”应该是牛首人身造型，而随着这种信仰不断发展、神化，其造型也逐渐拟人化，演变为人形，如后世多以孔子门生冉伯牛作为牛王。

此外，古代牛首人身的形象也包含有几分祈盼平安吉祥之意。据《说郛》记载：“少昊出野遇一兽，牛首而人身，惊归，告皇娥。娥曰：‘昔余闻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师，亲见之者百福胥臻，天将福汝，汝何妄惊乎。’帝乃释然。”^[6]可见，亲眼见到此牛首人身兽之人，能受到神灵的保佑，是一件有福之事。

前代这些关于牛首人身形象的流传与实例，往往蕴含着几分原始的图腾信仰和神灵信仰的意义，虽然并未直接影响了宋代墓葬中牛首人身俑的出现，但也说明牛首人身的形象出现在丧葬领域，并非偶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原始的信仰与崇拜在当时民间社会的映像。

二、宋代墓葬中牛首人身俑的发现

牛首人身俑，顾名思义，是造型为牛头，身作人形，且身形、服饰多似文吏俑的一类俑。据笔者所见发掘报告资料，目前在宋代墓葬中发现的牛首人身俑共有如下几件：

1964年11月，四川省蒲江县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墓，出土牛首人身三彩陶俑1件。^[7]该俑身着圆领宽袖绿袍，双手合抱于胸前。残高30厘米，肩宽10厘米，胸厚6厘米。

1983年12月，四川省邛崃县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墓，出土牛首人身陶俑1件。^[8]（图3）该俑头生两角，两耳外伸，仰首怒目，身着圆领长袍，两脚微露服外踏于方座之上，通高32.7厘米。该墓墓室内两壁之中部各有两个壁龛，西部有头龛一个，墓内随葬明器皆因早年被盗而失去原来位置，散置于墓室两侧沟内。这件牛首人身俑也不例外，据笔者推测其在墓葬中的原始位置应在于壁龛之中。

1985年5月，四川省邛崃县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墓，出土牛首人身陶俑1件。^[9]该俑头顶双角，两耳竖立，浓眉大眼，凸嘴，怒目瞪视，身着交领窄袖落地长袍，腰束带，脚登履，通高35厘米。

1988年5月，江西省德兴县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墓，出土牛首人身俑2件。（图4）^[10]该俑身穿圆领长袍，前垂宽衣带，脚蹬翘头尖靴，身作文吏俑造型，均双手执笏板于胸前作侍臣状。红彩均已剥落退色，通高15.4 - 17厘米。出土时与其他随葬明器一并放置于墓室前端。

1997年1月，四川省蒲江县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墓，出土牛首人身陶俑1件。^[11]该俑着圆领窄袖黄色长袍，通高31厘米。该墓墓室南、北壁上各用砖砌有8个壁龛，东壁砌有龛3个，均为安置陶俑之处。

1999年10月，四川省成都市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墓，出土牛首人身陶俑2件。^[12]该俑头戴三梁进贤冠，着圆领宽袖长袍，腰革束带，两靴外露。该墓为一座夫妻合葬墓，所出2件牛首人身俑分别发现于南北两座墓室，放置在墓室南边沿与墓壁之间的沟槽之中。

考古发现的牛首人身俑，数量不多，主要集中于今四川、江西两省，在墓葬中的位置不一，有的置于龛中，有点摆放于墓室一角，有的已与其他明器一同被扰乱，失去原貌。但此类俑在墓葬中的功用还是有其值得思考之处。

三、宋代墓葬中牛首人身俑的功用

不同于宋墓中的牛首人身俑，考古发掘中也有早期牛首人身造型的实例。如陕西、山西、甘肃敦煌地区汉晋时期墓葬中，有许多牛首人身的图像（图5）出现在墓内照墙的画像砖之上，^[13]多身着官服，手持

笏板，仿佛站立在阊门之前。同时在阊门的另一边，往往还有鸡首人身图像，与其相对应，两者仿佛是升天之门两边的守护者。此类图像在墓葬中的功用反映了当时丧葬中的天人感应、灵魂升仙思想。综观前文所述宋代墓葬中出土的牛首人身俑，依据在墓中功用的不同可将其分作两类。

1、墓葬中作为十二时俑之一的牛首人身俑

江西省德兴县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墓出土的2件牛首人身俑应属于此类，为墓中整套十二时俑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类俑通高约15厘米，与墓中其他随葬明器一并摆放于墓室前端。该墓为宋代蓝良蔚与其妻的合葬墓，故墓中共出土有两套十二时俑，共20件，其中鼠、虎、龙、猴各只有1件，其余均各2件，皆为兽首人身造型。



图4 十二时俑中的牛首人身俑

十二时俑最早出现于北朝时期墓葬中^[14]，其中与地支“丑”相对应的牛俑，在造型上历经动物俑、兽首人身俑、俑带动物俑、人物俑四个阶段。1983年，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群的第二次发掘中，于17号墓出土十二时俑5件，其中1件牛俑，为动物原型，泥质无彩，造型写实逼真。^[15]隋唐之际，十二时俑的形象开始多以兽首人身的相貌出现在墓葬之中。隋初两湖地区墓葬中，始现兽首人身造型十二时俑，且多为坐姿（图6）。如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610年）墓中，出土青瓷十二时俑12件，其中的牛首人身俑，盘坐，着右衽大袖长袍，双手置于腹前。^[16]唐开元年间，兽首人身造型的十二时俑逐渐演变为立姿。如陕西西安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墓中，出土泥质红陶十二时

俑12件，其中的牛首人身俑作拱手直立状，身着交领广袖右衽袍服，双手隐于袖内。胸下高束博带，下饰襴边，袍长曳地。足蹬高墙履，为顶部略圆的方头，履头露于袍下。^[17]及至宋代，墓葬中出土的十二时俑以俑带动物形象居多，兼有兽首人身与人物俑造型。如四川蒲江五星镇宋熙宁五年（1072年）墓出土十二时俑12件，头戴冠，着圆领宽袖落地长袍，双手持笏，牛等十二种动物附加在冠顶。^[18]而江西进贤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吴助墓出土十二时俑12件，头戴平顶冠，额前刻一“王”字，衣着与同墓所出文吏俑相同，身着圆领长袍，腰束带，手捧牛等十二种动物头像。^[19]兽首人身造型的十二时俑在前代比较普遍，而绍定三年（1230年）墓出土的这两件牛首人身俑则比较少见的宋代兽首人身造型十二时俑，沿袭了唐



图5 墓室照墙上的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像

俑遗风。

此种类型的牛首人身俑，与其他兽首人身俑一起，组成十二时俑，代表的不仅是十二时中的“丑时”，而且是十二支中的方位“丑”。在墓葬中可以从时间十二时，空间十二支所代表的十二方位，即从时空领域全面的保卫墓主灵魂安宁，免遭鬼魅侵害。十二时俑的造型最初没有采用人形，而是十二兽的形象，后世又逐渐向半人半兽、人形化过渡，这应与古人吸收了原始信仰和神话传说中关于天体神灵、神兽仙禽以及神仙羽人等的崇拜，将十二地支和十二种动物相联系的传统有关，十二时俑的出现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产物。

2、墓葬中单独出现的牛首人身俑

四川省邛崃县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墓、四川

省蒲江县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墓、四川省蒲江县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墓、四川省邛崃县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墓中出土的牛首人身俑都属于此类。这几座墓中往往也伴有十二时俑发现，为人物俑造型，只是胸前捧有不同的动物，因此可以明确此类俑不同于十二时俑中的牛首人身俑。此类俑通高约30厘米，高于宋代墓葬中出土的前一类牛首人身俑，在墓葬中摆放的位置也不一。笔者推测宋墓中的此类牛首人身俑不仅能够沟通天地，而且应与“阿傍”有关，是利用阿傍在民间信仰中成为阴间的神灵，在墓葬中起到震慑鬼魅、保卫墓主灵魂的作用。

阿傍，亦作“阿旁”、“阿防”，最初来源于佛教经籍，伴随佛教的冥界信仰而逐渐被民间社会所接



图6 隋代青瓷十二时俑（居中为牛俑）

受。古代中国的阴间鬼神信仰，纷繁复杂，融合了佛教、道教诸信仰，如佛教中的阎罗王成为了冥界的神灵，主管地狱。《法苑珠林》曰：“阎罗王者，昔为毗沙国王，经与维陀如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领百万之众。头有角耳，皆悉忿怒，同立誓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阎罗王是。十八大臣者，今诸小王是。百万之众，诸阿傍是。”^[20]阿傍作为阎罗王曾率领的“百万之众”，也逐渐被纳入民间鬼神信仰其中，由此成为地狱中的鬼卒。

从造型上看，佛经中的阿傍多为“头有角耳”的牛首人身形象，据《五苦章句经》：“狱卒名阿傍，

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叉，叉有三股，一叉罪人数百千万”。^[21]阿傍与墓葬中的牛首人身俑皆为“牛首人身”，稍有不同的是佛经中的阿傍，往往手执钢叉，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这是由于伴随佛、道两教在民间丧葬领域的进一步融合，尤其是佛教世俗化的发展，佛教中的冥界诸神也彻底被纳入中国本土的神系。“阿傍”信仰在民间社会逐步演化成为一种“牛头”信仰，而并非为佛教所专有。所以墓葬中发现的牛首人身俑已无佛经中阿傍手执铁叉的凶相，而是多手捧笏板、身着官袍，虽为牛首，却呈一派文官形象，但其往往怒目圆视，也保留了些许文献中所记阿傍的神韵。

从在冥界的职能上看，据《铁城泥犁经》：“泥



图7 牛头与马面形象



图8 马首人身俑

犁卒名曰旁……泥犁城有四门周匝四千里，中有大釜长四十里。泥犁旁又刺人而内之，如是无央数中皆有火，人遥见之皆恐怖战栗，如是入者数千万人泥犁旁而内其中，昼夜不得出门皆闭不开不得出。”^[22]“泥犁”即地狱，由此可见，阿傍在阴间地狱是一类常见的鬼卒，担任巡逻和搜捕犯有罪孽、遭受苦报之人的差役。唐人所撰《大唐传载》中也曾提及所谓“牛首人”，当时仍与佛教密切相关。“贾至常侍平生毁佛，尝假寐厅事，忽见一牛首人，长不满尺，携小锅而燃薪于床前，公惊起而讯之，对曰：‘所谓饕汤者，罪其毁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床下，其汤沸，忽染于足，涌然而上，未几烘烂而

卒。”^[23]可见，贾至由于毁佛，因而受到了“牛首人”的罪责，此“牛首人”正是行使了对犯有罪孽之人进行惩罚之职，尤其是毁佛之人。唐宋之际，灵魂不灭等鬼神信仰对丧葬观念产生的影响也愈发深远。而古代中国的民间信仰，往往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在墓葬中需要一种安亡灵、除恶灵、通天地的镇墓神煞。因此伴随佛教对民间信仰的现实影响逐步加深，即佛教逐渐世俗化的过程继续发展，作为冥界地狱缉拿罪孽之人的鬼卒阿傍，成为了墓中驱除邪恶、保佑墓主灵魂的一员，起到此等功用的牛首人身俑也开始在宋代墓葬中出现。

另外，在文献之中，与“牛头”相对映的还有所谓“马面”（图7）。《楞严经》曰：“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面罗刹，手执枪矛，驱入城门。”^[24]《景德传灯录》记载：“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释迦是牛头狱卒，祖师是马面阿婆。”^[25]考古发掘中，也在墓葬中发现了“马首人身俑”，如四川蒲江五星镇宋熙宁五年（1072年）墓出土马首人身俑1件（图8），马头稍残，身着交领窄袖落地长衣，通高31.2厘米。^[26]同一墓中成对出现“牛首人身俑”与“马首人身俑”的情况还尚未发现。

综上所述，宋代墓葬中的牛首人身俑，分属于不同两类，并且从不同的层面上起到在墓葬中保卫墓主灵魂的功用。尤其是独立出现的牛首人身俑，源自佛教中的“阿傍”信仰，并逐渐被民间信仰所吸收、融合，应用于丧葬之中。伴随更为丰富的墓葬、实物资料的发现，对于此类俑的研讨也将更为深入。

注释：

- [1]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影印本，第四册，卷八一九九·大汉原陵秘葬经，中华书局，1998年，第3829页。
- [2] 唐·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1页。
- [3] 清·马驥：《绎史》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5册，第83页。
- [4] 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47册，第613页。

- [5]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 [6] 元·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一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7册，第689页。
- [7] 龙腾：《蒲江北宋宋燧墓出土文物》，《四川文物》1996年第5期。
- [8] 邛崃县文物管理所：《邛崃县北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85年第3期。
- [9] 邛崃县文物保管所：《邛崃县发现一座北宋墓》，《成都文物》1987年第4期。
- [10] 德兴县博物馆：《江西德兴县香屯宋墓》，《考古》1990年第8期。
- [11] 龙腾：《蒲江北宋魏忻、魏大升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97年第6期。
- [12]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5期。
- [13] 赵吴成：《河西墓室壁画中“伏羲、女娲”和“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图像浅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
- [14]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 [15]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 [16] 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
- [17] [2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 [18] 陈显双、廖启清：《四川蒲江县五星镇宋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 [19] 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 [20]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4页。
- [21] 东晋·竺昙无兰译：《五苦章句经》。
- [22] 东晋·竺昙无兰译：《铁城泥犁经》。
- [23] 佚名：《大唐传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35册，531页。
- [24] 蜜帝译：《楞严经》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
- [25]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一。